



廉政文化丛书



廉政风范

中共重庆市纪委监教室 /编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廉政风范

中共重庆市纪委宣教室 / 编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廉政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任：徐敬业 徐海荣

委员：李维超 周 波

杨恩芳 罗小卫

袁建中 王增恂

陈兴芫 喻 杨

姬晓辉 黎延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廉政风范 / 中共重庆市纪委监教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3

(廉政文化丛书)

ISBN 978-7-229-06374-0

I .①廉… II .①中… III .①廉政建设—中国—通俗读物 IV . ①D63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8857 号

廉政风范

LIANZHENG FENGFAN

中共重庆市纪委监教室 / 编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陈 恳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蒋忠智 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1.5 字数:210 千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374-0

定价: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

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不渝的崇高追求，是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廉政文化是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等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是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弘扬和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注重治本的客观要求，是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积极倡导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和需要探索的新课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对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传播廉政文化氛围，中共重庆市纪委宣教室在多年探索、实践基础上，总结、整理出全市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又组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撰文，编写了《廉政文化丛书》，先期推出《廉政故事》《廉政风范》《廉政警言警句》《廉政歌曲》《廉政漫画》共五本。其中，《廉政故事》是在近年来重庆市开展廉政故事创作大赛获奖作品中精

选出的优秀的、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示范警示作用的故事；《廉政风范》集中展现了不同时期在重庆地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局和川东地下党的廉洁风范；《廉政警言警句》收集古往今来有关廉政、勤政的脍炙人口的警言警句；《廉政歌曲》选撷重庆市纪委近年来征集的重庆市廉政歌曲创作大赛中的优秀作品；《廉政漫画》是在重庆市纪委组织动漫画创作大赛中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包括丰富生动的廉政漫画、公益广告和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绘制的漫画。

这套《廉政文化丛书》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营造社会清正廉洁之风的通俗读物，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以德为政、廉洁奉公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也是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敬廉崇洁、立志修身的良好读本。

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常虑百姓之事。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读廉政好书，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和勤政廉政握手！

— 目录

CONTENTS

出版说明/1

不要遗产要真义/1

饥寒交迫的“宣汉大地主”及其
朋友们/4

“地主少爷”的选择/7

毁家纾难的“蜀中彭湃”/11

疏财仗义、立志革命的王良/15

漆鲁鱼万里寻党记/19

一起动手修大楼/23

周恩来生日与《我的修养
要则》/27

董必武的检讨/31

警卫副官眼中的周恩来/34

邓颖超母亲在红岩/40

红岩人的艰苦生活/44

“平坟还耕”为人民/49

艰难奋斗的省级干部/54

三块银元和十万两黄金/58

百万富翁与无产者/65

多交出的党费/72

被市委书记告发的人/74

楼上楼下的两党对比/76

有霉味的汤面/78

警世雄文《甲申三百年祭》/80

一个党外的经济工作者/86

“大污池”中的白莲花/89

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犯罪行为，
千万不能/92

自谋生计的张文澄/96

红岩办事处菜地/99

大华炼油厂——为党献出
一切/102

“党内另一位很能干的
老板娘”/107

金妈妈的三个应该与不应该/112

刘国鎰：有党在，我等于没死/116

把“渝舍”、“王园”还给人民/120

武装改造小弟弟/123

跳舞风波/126

狠批“五里腿”/128

“民大于天”/131

家乡的“白市柚子”最好吃/134

— 目 录

CONTENTS

- 怒诛“陈世美”/136
- 皇帝也有几门草鞋亲/140
- “乱弹琴”/146
- 首长的伙食标准/148
- “太行是老大，不能带这个头”/150
- 谁也不知道他是刘伯承的儿子/153
- 惩治豆腐渣工程/156
-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158
- 杨尚昆家的“四知堂”/161
- 公仆典范曹荻秋/163
- 领导岗位上的红岩人/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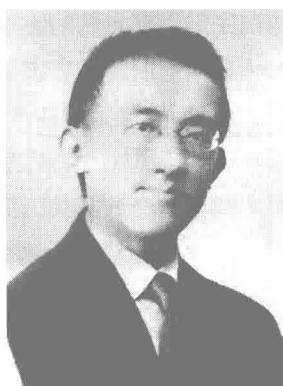
不要遗产要真义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这是著名四川共产主义先驱、早期四川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杨闇公的人生誓言。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亲五弟。

1898年杨闇公出生于重庆潼南双江镇。少年时即有报国之志，15岁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思想开始逐渐向共产主义转变。1924年初，他同吴玉章在成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1926年2月，统一领导全川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杨闇公当选为书记。1926年秋，针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万县九五惨案，杨闇公领导地委果断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给英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其影响波及全川以至全国。1926年10月，杨闇公兼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领导发动了著名的泸顺起义，为党领导武装起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27年3月31日，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杨闇公于次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于4月6日壮烈牺牲在重庆浮图关，以年仅29岁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誓言。

杨闇公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搜查杨闇公的家，格外值得庆



杨闇公

幸的是没有搜到杨闇公生前所写的3本日记。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杨闇公的夫人赵宗楷临危不乱，机警过人的胆识，将杨闇公的3本日记（这3本日记，记录了杨闇公1924年至1926年间的革命活动）和其他遗物藏在潼南县双江镇他家阁楼墙洞里，一藏就是20多年，直到解放时才取出来，把它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在杨闇公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不要遗产要真义的心声。

杨闇公家在当时的潼南双江镇是望族首富（曾祖父杨世绥经商开办“杨三泰”大商号，大量购买田地，大力进行智力投资。父亲杨宣永家有田产400亩，只是后来为了送子女读书和出国，为了支持子女的革命活动，不惜典卖家产，因此解放时他家仅有少量田产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经济拮据濒于破产），加上杨闇公8岁时过继给他那没后的叔父杨霞峰为子，因此他一人就占了一房的家产。但他从小就受到天赋人权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不平等的旧社会十分不满，所以他不愿靠先人留给他的遗产在家里坐享其成，偏偏要想到外面去“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为此还被封建族长绑去祠堂打过板子，但他还是在15岁那年就远离了家乡，只身跑到南京去投考了江苏军官教导团。这一去就是七八年，在外面挨饥受冻，流血流汗，被追缉，坐班房，什么苦都吃过，但他却心甘情愿。

1920年，杨闇公因在日本声援国内五四运动而被判刑坐牢。回国后，他本可以从此回老家坐享产业了，但他却用自己的钱去干革命，如果遇上同志们有什么困难，还要用自己的钱去资助。就这样，杨闇公的家当时就成了党在重庆的“招待所”，党团同志没住处就去他家住，没饭吃就去他家吃，所以那些封建的族人都说他是“自找苦吃的败家子”。

1924年，他生父家由于兄弟姊妹多，且多在读书，一家人又分住潼南、重庆和成都三地，生活费用都来自潼南，加上潼南又缺乏人去料



重庆二府街70号，杨闇公的家，即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地

理，所以弄得经济十分拮据，有时连弟妹们的学费都没钱交。为了解脱家庭的困境，他生父家写信与他商量，准备变卖他继承叔父的200多亩田产。杨闇公接信后当即回信说：“我回国后至今未谋职业，虽然有人曾为我在部队谋一差事，但我川军人寡廉鲜耻到十二万分，实不愿与若辈为伍，生活尚仰赖于家庭，已深为惭愧了。况且一个人如依靠遗产，必养成惰性，因此我对变卖田产决无丝毫意见，即使将全部产业都卖掉，我也赞同。”只是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认为父亲太不能了解自己了，自己早就树立献身共产主义的志向，还有什么必要继承遗产呢。因此，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何人斯，岂能因区区遗产变我初志？人若恃先人的遗产为生，只可名曰吃饭虫，失去人生的真义。我即不学无术，宁饿死亦不受遗产。何况我早有归宿点的目的和进行的方道，哪里把遗产的有无，存于心中啊！”“我15岁到现在，敢说一年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天都在穷困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做的事，毫不以穷言为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闇公为了发展四川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他战胜了环境的险恶。他在日记中如是说：“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作为一名出色的领导人，杨闇公把“非有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怎能达最后的目的”和“我是旧社会的叛逆，新社会催生者”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为了向群众宣传，他经常抱病演讲。在他的日记中，多处记着“病仍未减，但责任迫我不暇顾及了，只好拼命去做”。他说过：“我将来不是病死，就是被反动派杀死，革命工作有什么休息可说啊！”杨闇公还将一双儿女的名字取为杨赤化、杨共产，以表达他“赤化全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的高远之志。

杨闇公对遗产和真义的这些观点和态度，在那些封建的私有者看来，他实在是一个“败家子”，但在革命者的眼里，这正是杨闇公背叛封建剥削家庭，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抉择和行动。

饥寒交迫的“宣汉大地主” 及其朋友们

1930年秋冬之际，一对年轻夫妇来到万县城东二马路北头，靠近芒溪河上的万安桥（俗称万州大桥）一家兼作栈房的小杂货店“兴盛和”，佃了房间住下。男的身材魁梧，气宇轩昂，自称是宣汉大地主，在下川东一带做鸦片生意，要杂货店老板今后帮忙收转信件，他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下川东特委书记项鼎（又名苏爱吾、苏幼农，四川邻水人）。那年轻女子是专门调来与项鼎假扮夫妻的，她是一年前由中共川东特委创办的红色学校重庆高中里有名的学生领袖杨锡蓉。

不久，一对老实巴交的年轻夫妻带着个小兄弟在另一条街佃了一家私房住下。这也是假扮的一家人。扮作丈夫的是中共下川东特委组织委员冯庆兴，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行委副主席。扮作小舅子的是共青团下川东特委书记李忠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万县县委书记。扮妻子的是万县城外驷马桥火柴厂的女工“张大姐”。

在一马路一家裁缝店楼上，住进了一个矮壮汉子，他是中共下川东特委兵委委员兼交通站长吴季霞。

作为中共下川东特委宣传委员的熊曼西，在“丈夫”中共下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陈劲言被捕牺牲后，就转移到城外驷马桥火柴厂当了女工，脱下假扮陈劲言“太太”时穿的夹大衣，换上“张大姐”给她的工人服，住到了工人的窝棚里。

还有两个下川东特委干部，则同那些下苦力的工人混在一起，住进了长江边上的简陋棚屋，他们是诸友勋和苏乃平，万县县委建立后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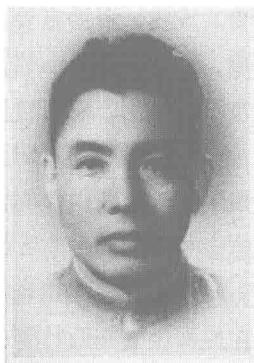
任县委组织委员和工运委员。

在陈劲言被捕牺牲后，共青团四川省委特派员余治平带着项鼎的妻子、原在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的黄梦谷来到万县，余治平参加下川东特委领导工作，黄梦谷担任万县县委秘书。项鼎夫妇和余治平以及小交通员王牛儿又扮作一家，在城内四方井街上租了一家鸦片商人的房子作为特委机关。这时，假扮项鼎妻子的杨锡蓉由省委另调了工作。

当时下川东特委的共产党人的生存环境，自称是宣汉大地主项鼎后来回忆说：“这时我们生活困难到了极点。我的手表衣服都当光了，只剩下床被子，一张床单，都快过年了还穿两件单衣。余治平来时，他穿的夹袍，于是我出街就穿他的，他则坐在床上披盖被子看文件，写工作计划，写报告和给各县的指示……而且顿顿吃稀的，四个人买两斤芋头，掺半斤米或面，煮一锅糊糊，撒点盐，不但没菜，关上门吃，怕房东看见，还不准喝得响，以免房东听见生疑。我们夜间工作，睡得很晚，经常饿得肚子叫，睡不着，又长期没吃油水，晚上总是吃不饱。因为饭少，就互相推让，我爱人和牛儿（小交通员）照顾我们两个男人工作多，要在外面跑，就说吃饱了，我们也照顾他们是女同志和小孩子，也就抢先放碗，假装吃饱了，其实大家都是假装的，所以一到晚上十一二点就饿得厉害。”

其他几位干部生活也一样的艰难，特别是诸友勋和苏乃平，一则因为没有家眷，二则因为特委拿不出那么多押佃钱，只得到江边鸡毛店去住宿。项鼎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用竹子搭的临时性棚棚，涨大水时可以拆走，白天卖饭，晚上宿客，住的一般都是下苦力的：船夫、拉纤的、拉车的，还有跑江湖的、卖艺的、算命的、卜卦的，三教九流都有，也有做小生意的，过往的船客。我们住在这里也有个好处，一是价钱便宜，几个铜子住一晚；二是没有门牌号数，晚上不登记不查号（一般旅店都要查）。”

诸友勋、苏乃平等人都得每天白天出去拉黄包车挣钱吃饭，同时在



项鼎同志

拉车中结识工人朋友，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小交通员王牛儿刚来时没接上头，也住在这种鸡毛店里，靠卖纸烟度日。

其实，下川东特委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建立下川东特委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他们筹措经费。他们主要通过长期坚持在川东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王维舟，用“打土豪”的方式从地主豪绅手里收缴一些鸦片、银耳（当时称作黑、白二金）等贵重物品，拿到万县变卖成钱，资助省委。就在陈劲言牺牲后，项鼎还派吴季霞去了一趟重庆，给省委送了一笔钱去。这些钱，说好是给省委的，他们就一个铜板也不会动用，宁可自己受穷，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干部的克己奉公精神。

下川东特委是四川省委的派出机关，其干部算得上是大官了，但这些干部却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这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若无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是显然不可能坚持干下去的。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的机构设置有这样一个惯例：省委在重庆时，便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省委在成都时，便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这样是为了便于在交通、通讯都很困难的条件下全川各地都能大致上得到统一指挥。在1930年底，省委设在重庆时，在万县建立了一个下川东特委，这跟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有关系的。

一是因为在前段时间里贯彻“立三路线”，各地盲目举行暴动，结果导致地下党组织大暴露、大破坏，为了尽快恢复发展下川东各县（梁山、万县、忠县、达县、渠县、万源、石柱、丰都、宣汉、大竹、云阳等地）遭到破坏的党、团组织，建立和发展下川东革命武装力量，有必要设立一个能就近指挥下川东地区的领导机关。二是为了在下川东设立一个为经费奇缺的省委筹集钱款的据点。三是为了建立中共中央与四川省委之间的交通联络中转站。那时中共四川省委与中央之间的通讯联络十分困难，靠邮寄，有被查获或丢失的危险；靠专人送，又因“蜀道难”，费时费力。这时，中央有了派驻武汉的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央的文件信函可以由汉口或宜昌入川轮船上的水手带到万县。四川省委在万县设立一个中转站，便可以较快较可靠地与中央保持联系了。

“地主少爷”的选择

一个人，出身名门富户，却为工农大众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小受的封建伦理教育，后来却成长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家人一往情深，却始终坚持革命第一；他长年背井离乡为革命工作，过着漂泊孤零穷苦的生活，却“常常感着对人类没有贡献为可耻”。他就是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长杨仁杰。

杨仁杰于1903年出生在川北西充县的一个豪绅大户家庭里。父亲是清末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在那穷乡僻壤之地，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势。杨仁杰是独子，父亲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成就其地主家庭的大业，从小对他严加培养，用心良苦。杨仁杰自幼刻苦学习，立志做“富有学问之贤者”，从小过着衣着“高贵”、“无肉不开饭”的地主少爷生活。但与此同时，在战乱不已、贫困落后的川北农村，杨仁杰目睹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境遇，又寄予深切的同情，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

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和对外来新思想的研究中，杨仁杰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于1926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誓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为了实现其美好的理想，他心甘情愿放弃了锦衣玉食、飞黄腾达的个人前途，投身到了艰苦险恶的革命斗争之中。在物质生活方面，他当时在上海读大学，他家每年给他的四五百元学费，可以使他过着较为舒适的大学生活，但他却“务求节俭”，“对于衣食这两件事，但求不饥不寒就好了”，“始终不羡慕那些贵族式

的装束”，而把大部分的钱捐献给组织作为革命经费，或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志。

1928年春夏，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成都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之后，成都地区“党的工作展不开，许多党员退党，组织萎缩、孤立，群众团体瓦解”，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同年夏，杨仁杰服从组织安排，从上海回到四川，投入成都地区的斗争。

1929年初，党中央要求党员职业化，以便“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同时，也解决党员的生活问题。为了贯彻党的指示，杨仁杰耐心动员说服他的父亲变卖了近100石的产业，他将这笔款带去成都，为地下组织开办了一个石印铺，开设了两家书店，既作为地下活动的据点，又用以维持一些同志的生活。在此期间，杨仁杰对家庭一往情深，又始终坚持革命第一，极力争取他的家庭支持革命。他曾多次请求他的父亲变卖家中全部产业，举家迁往成都，借以支持和掩护他做职业革命家的工作。

作为独子，杨仁杰本来已该成为当家人了，但他长年在外奔走革命，连爱子出世后也没有回家见过一面，在他由上海回川途中也没有绕道回家探望，而是抱病直赴成都参加革命工作（参加了成华县委的领导，担任成都大学党支部书记），更不用说做他那地主家庭祖业的继承人了。在他父亲为祖业无人继承而忧伤叹息的时候，在他的娇妻幼子望眼欲穿地盼他早日归家的时候，他却在成都为发动工人运动（1929年12月至次年4月，任成华特区城区区委书记）而旧帽遮颜、破衣蔽体，拉着黄包车在大街小巷奔走，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道路。

然而，1930年底，广汉兵变失败后，成都地区军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杨仁杰也身份暴露，所办石印铺被捣毁，书店被查封。杨仁杰处境危险。1931年2月，组织决定调杨仁杰到重庆工作。在这已有连续三届地下省委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牺牲的险恶之地，“常常感着对人类没有贡献为可耻”的杨仁杰继续开展艰苦的工作。

1931年6月，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情况紧急，杨仁杰临危不惧，代理川东特委书记职务。7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销川东特委，成立

江巴中心县委。由于王明路线唯成分论的错误，“地主少爷”身份的杨仁杰任组织部长。他不计个人名位得失，全心全意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1931年9月9日，以《新蜀报》记者为掩护职业的杨仁杰手拿一把折扇，迈着不快不慢的步子，从重庆下半城东边的白象街报社院内出来往西走去。他穿过几条小巷，不时侧过头警觉地瞥一眼身后，混杂在来往人群中，走上了连接上下半城的那条大道“十八梯”。

“十八梯”是重庆城西往来上下半城之间的一条主要通道，原是一道长而宽的缓坡，比较便于挑抬货物的下力人行走，只在坡上边接近较场坝的陡处砌了十八步石级，因而被叫作“十八梯”。后来因石级毕竟比土坡好走，特别是下雨天不易滑倒，有石级的路段逐渐增加，早已超过十八之数。这条路上来往的人多了，两边就逐渐形成了街面，开了不少方便人们歇脚的小茶馆。当天，中共地下组织就约定在十八梯路边的一家茶馆里开会。

杨仁杰走进茶馆，看到一张桌边已经坐着一个满脸胡须的汉子，那是威震川东的农民起义领袖李家俊，此时是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军支书记。李家俊一副中医游方郎中打扮，手里捧着一个白铜水烟壶，正在悠闲地抽着水烟。他前面的茶碗边摆了一个江湖郎中常用的青布包袱。看到杨仁杰进来，李家俊向他会意地一笑。杨仁杰也含笑致意，在旁边坐了下来。

杨仁杰借喊上茶之机，看了看四周。他看到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的一个军支干部，负责保卫工作的地下特务队领导人李惠康坐在另一张茶桌边，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还没有到。

突然，茶馆门外传来一阵喧闹。随着一阵放肆的说笑，门外走过几个年轻人。杨仁杰猛然发现不妙，急忙扭回头来，但已经晚了。门外走来的是几个21军特委会的侦缉员，其中一个叫刘文达。刘文达是杨仁杰在重庆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刘文达这会儿本来是带着人从这里路过，没想到无意中向茶馆里一瞥，竟然看到了他昔日的上级领导杨仁杰！

刘文达喜不自胜，激动得声调都变了，狂呼着：“那是杨仁杰，大共产党，快点逮到！”茶馆太小，门口被堵住了，事情又发生得太突然，杨仁杰还没有想出对策，刘文达已挥舞着手枪冲到了身边。

坐在一旁的李家俊听到喊叫时便已站起身来，他迅速分析了眼前的形势，特务人多，而且有枪，硬拼显然不行。眨眼间，他已从提到手里的包袱中抓出一把把小铜板向特务们掷去，然后向杨仁杰喊了一声“跑”，同李惠康一起趁乱撞倒两个特务，闪身混入慌乱的人群中。

李家俊的本意是引特务们来抢钱，好让杨仁杰抽身逃跑，有两个特务的确也下意识地俯身下去抓钱而被奔逃的人们挤翻在地。但刘文达哪里把这点小钱看在眼里：抓到一个共产党，得的赏钱会比这多得多。李家俊和李惠康脱险后，才知道杨仁杰被刘文达死死扭住不放，未能脱身。

杨仁杰被捕后，即作为重要的政治犯送到 21 军军部。敌人千方百计诱降杨仁杰，派人对其进行“感化”，结果反被杨仁杰感化。酉阳县旅渝军官曾准备共同营救，但要杨仁杰说一句愿意“自首”的话，即可安然脱险，并有大官可做，杨仁杰婉言谢绝。刘湘派严纯武（严纯武是刘湘的家庭教师，也是杨仁杰的亲舅父）以骨肉之情，生死之忧，封官许愿，苦口劝降。杨仁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更不为名利所动。他大义凛然地对其舅父说：“你要说的话，要做的事，我早就知道，你去做你的官，我当我的囚犯，我愿做共产党的鬼，不愿做国民党的官。”严纯武羞愧无以自容，狼狈而去。诱降不成，敌人转而采取刑讯。他们用竹签钉其手指、足趾，背火背篼，各种酷刑将杨仁杰折磨得遍体鳞伤，筋断骨折。但是，任何毒刑也无法改变杨仁杰的坚贞意志。

1931 年 10 月 29 日，反动军阀杨仁杰、李家俊（1931 年 10 月 26 日，李家俊被叛徒刘文达认出被捕）同时杀害于罗家湾刑场。两个“地主少爷”的鲜血流到了一起，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年仅 28 岁。当年在江巴中心县委筹办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邹文奎，亲眼目睹了两位领导人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家俊表现得从容镇定，仁杰则表现得慷慨激昂，皆沿途高呼口号，家俊喊‘打倒国民政府’，仁杰喊‘打倒军阀刘湘’。我在他们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的杨柳街 72 号三楼上，亲眼看到他们的英姿和听见他们所呼的口号。”

“常常感到对人类没有贡献为可耻”的杨仁杰，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英勇就义，牺牲前，竟未能见到自己亲爱的父母、妻子和爱子最后一面。